

# 20世纪初以前华侨移民缅甸述略

## ——兼论缅甸华侨社会的形成

冯立军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初以前中缅之间贸易及人员往来的过程,认为双方交往肇发端于汉代,但直至元代时,才有华侨定居于缅甸。到了明代,华侨社会开始在华侨人口较为集中的上缅甸的部分地区形成和出现。清代是华侨大规模移居缅甸时期,既有陆路迁移也有海路迁移,随着华侨大量移居缅甸,一些能够聚合缅甸华侨的纽带,如地缘组织、血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纷纷成立,华侨社会则在缅甸较多地区形成。

**关键词:**缅甸;华侨社会;移民

**中图分类号:**D634.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8)04-0048-09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双方的交通联系已有2000多年。在彼此的交往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寓居于缅甸,成为华侨。其中,有因贸易不归而留居者,有为政治避难而逃逸于彼者,也有是从事战争而被羁縻无法返回者。时光荏苒,随着华侨人数的渐次增多,以及中华文化的不断移植,缅甸华侨社会逐步形成。

### 一、明代以前中缅贸易与移民

#### (一)宋代以前中国与缅甸的贸易交往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竹杖,说明中国与缅甸之间的陆路贸易在我国的西汉时期即已存在,这些商品沿着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北部到印度的陆上交通线,而运至印度,再转运到大夏。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以及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时,掸国王雍由调曾两次遣使沿着这条商路到中国。其后顺帝永建六年十二月

\* 收稿日期:2008-08-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840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立军(1970-),男,河北宽城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在职博士生。

· 48 ·

(公元 232 年 1 月),掸国亦遣使贡献。到三国时期,蜀地商人仍积极从事着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商贸活动。<sup>[1]</sup>

由于中缅交往的发展,云南永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商贸重镇。有很多国家的货物通过伊洛瓦底江运到缅甸北部,然后转运到云南永昌,故有“永昌出异物”之说。<sup>[2]</sup>永昌对外贸易的发展,吸引了很多外国商人到永昌来经商,主要有“闽濮、鸠獠、僮越、身毒之民”。

唐宋时期,在云南大理一带曾存在过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南诏靠近缅甸,相互之间有贸易往来。骠国常派信使到云南,“以江猪、白鬣及琉璃罍为贸易”。<sup>[3]</sup>缅甸境内的弥臣国也有一些物产在相互的交往中传到云南。据《云南记》所载,云南所产的青色大腹槟榔,每朵有数百颗,是从弥臣国传进来的。<sup>[4]</sup>

中缅之间的海上往来至少在汉代也已经存在,《汉书 地理志》所记中国通印度的海上航线途经之夫甘都卢国,据考证即为缅甸的蒲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缅双方贸易交往的扩大,在中文古籍中多有记载缅甸的重要国际商埠。如《梁书》中提到缅甸的丹那沙林南部地区有一个古国名顿逊(典逊),其“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sup>[5]</sup>《洛阳伽蓝记》中则记述了从顿逊到我国南方港口的里程。

宋代,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缅之间的贸易往来,尤其是海上联系进一步加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言,当时真腊、罗斛、蒲甘的商船常到福建沿海的港口进行贸易。尽管这些国家“多不见史传”,但“市舶司有之。”<sup>[6]</sup>

由于中缅之间往来的频繁,中国对缅甸的记载也增多起来,像《宋史》中有了专门的蒲甘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也有了蒲甘的专条记述。赵汝适在该条中记载说:“国有诸葛武侯庙”。<sup>[7]</sup>对此,有的人认为蒲甘不可能有诸葛武侯庙;但也有人认为其存在是有可能的。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诸葛亮“南征”时,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对缅甸产生了影响,因而得到缅甸人民的崇敬。<sup>[8]</sup>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诸葛武侯南征,虽然“仅及永昌、牂牁诸郡,未深入缅境。而缅地有武侯庙,盖孟获实即缅甸。故土人言七擒七纵事犹能历指其处云。”<sup>[9]</sup>看来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得孟获及其族人心悦诚服,故将其奉为心中偶像,立庙以表心中敬意。而陈碧笙先生则认为诸葛武侯庙的建立是当地已有华人居住之一证。<sup>[10]</sup>或许在宋代,华侨即已在缅甸蒲甘出现,因为云南人对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非常崇拜,云南商贾到缅甸经商留居于该地,故将其崇敬偶像也移植到新的移居地?但遗憾的是,在史书中没有任何史料来支持这种结论。

总之,中缅之间海、陆贸易在这个阶段得到开辟,并有初步发展,从事贸易者以云南的大理人和四川人为多,他们多从陆路到达缅甸,但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证明当时有华侨寓居缅甸,更谈不上有缅甸华侨社会的存在了。

## (二) 元代缅甸华侨的出现

元代中缅之间曾发生 3 次战争,但是两国人民在其间所进行的贸易往来、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从元代开始,中缅之间进行大规模的玉石贸易。由于缅甸本国人民无法开采,因而中国人将开采玉石技术传入缅甸,玉石通过缅甸北部的滇缅陆路运入云南腾冲加工,制成精致的装饰品,远销

---

“北行一月至勾稚国(位于马来半岛北部)。北行十一日,至典逊国。从典逊国北行三十日,至夫南(今柬埔寨)国。……从夫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出林邑,入萧衍国。”(杨銜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校注》卷 4,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235 页)萧衍是梁武帝名字。到萧衍国,就是到了我国南方的港口。

据《三迤随笔点苍武侯祠遗址》记载:“武侯歿,孟氏念孔明仁厚,以檀香雕像供于佛光寨,以立秋日祀之,以求丰登。”这条史料说明诸葛亮之被神化,始于孟获,在迤西开孔明神话之先河。

各地。经营滇缅之间的玉石贸易,获利较丰,因此不少中国人前往缅甸北部开采玉石,亦有不少云南的珠宝商在缅甸开业<sup>[11]</sup>,成为至少在短期内寓居于缅甸的中国人。

不仅在上缅甸,甚至在下缅甸也有华人居留。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提到,在乌爹(缅甸勃固地区),贸易之货有中国出产的五色缎、白丝和清白花器。中国元朝的货币“中统钞”甚至与当地的货币“银钱”有准确的比价,“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由于该地区“知务农重谷,使国无游民,故家给人足,岁无饥寒之忧”,“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sup>[12]</sup>

除了因贸易而居留于缅甸者外,还有一些非贸易移民。据记载,元世祖曾派遣乞解脱因、勘马刺失里等使缅甸,招谕其主内附,结果被缅王所杀,其所带随从都被羁留于缅甸。到1299年5月10日,缅王梭梭被杀,蒲甘城内大乱,先前被羁留之随从,包括回回、畏兀儿以及汉人有百余人皆被屠杀。<sup>[13]</sup>

应该说元代中缅之间的贸易在继承了汉唐宋等朝代的基础上仍然有所发展,其从事贸易者以云南省籍最多,四川居其次,他们的贸易对象,多为中缅边境的部落民族。在长期的贸易交往中,逐渐出现了定居于缅甸的华侨,定居者除了有一部分从事贸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垦殖和畜牧业,地点多选在缅北及掸邦高原地带。<sup>[14]</sup>

### (三)明代中缅贸易的发展及缅甸华侨社会的出现

到了明代,中缅两国的玉石珠宝贸易更是盛极一时,中国商人在缅甸政府的许可下,纳税开采,每年去缅北开采的工人多至千人,产量多时每年有数千担,在缅甸经营玉石珠宝的商店多至百余家。<sup>[15]</sup>由于缅甸的玉石、宝石和琥珀大量输入中国,遂使腾冲成为著名的玉石手工业产地,甚至云南的省城昆明在当时也有很多解玉坊,据说“苍沙之声昼夜不歇”。<sup>[16]</sup>

中缅之间的丝绸贸易亦较为繁荣,缅甸作家貌叫温说:“从15世纪开始,中国商人就循着从永昌至缅甸勃固的商道,把中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源源运抵勃固。”<sup>[17]</sup>西方学者史谷特(J. G. Scott)曾对从我国云南到缅甸的这条西南丝路记载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的驮运商队(即马帮)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sup>[18]</sup>哈威在《缅甸史》中也提到:“公元1541年缅王莽瑞体攻陷下缅甸沿海商业城市马都八(今莫塔马)时,发现仓库中藏满丝绸等货物,当时世界各国商人云集”<sup>[19]</sup>,可见该地丝绸贸易之盛。

除丝绸外,中国输往缅甸的贸易商品还有盐、茶、麴、帛等,有时也有零星的武器和中国的铜币被偷运至缅甸。

贸易的发展,使得因贸易而移居者日渐增多,据明人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记载,在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sup>[20]</sup>蛮莫也因华侨聚居日多而日渐繁荣。又《西南夷风土记》中有记载说,“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sup>[21]</sup>很明显此处武侯南征碑成为区别华侨与普坎缅甸人居住区域的一个重要标识,亦是这一区域内华侨在心理上所一致认同的信仰,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居住区域——云南,诸葛武侯是他们崇敬的偶像。

亦有非贸易移民的存在,据记载,明末跟随永历帝入缅的人数很多,有文武官员400多人随行,另外还有3000多人同往。虽然在缅期间,人员有一定损失,但所余者仍不少。另有李定国、白文选的队伍,在入缅迎驾时有“精兵万人”,即便是退回猛艮后也有3000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同永历帝的随行人员一样流落在缅甸,分散居住于缅甸各地。

---

据记载,随永历帝入缅的3000多人,入缅后至蛮莫,到大金沙江边时,尚有1478人。由于船只不足,从舟行的有646人,余皆陆行。从舟行的人员随永历帝到了实皆。从陆行者,部分被缅人所杀,部分“安置远方”。另有“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罗国”。

有记载说,桂王的从者在桂王被引渡给清军之后,留在阿瓦东部地区专事农耕,在距阿瓦百里的地方建起了叫做望乡台的村落,经常在此聚会怀念故土。同时,为了缅怀桂王,号称桂家,聚众数千。<sup>[22]</sup>我国古籍中也有记载说过:“桂家者,江宁人,故永明入缅所遗种也。”<sup>[23]</sup>

桂家虽然长期居住在缅甸,但还保留不少汉族的风俗习惯。据缅甸的《百科全书》记述,每个桂家村落都有一间神庙和一尊神像,神庙中常发现有汉字。他们不信奉佛教,每月初一、十五是他们敬神的日子。人死后用棺木土葬,有钱人家还用金银首饰陪葬。父母死后,财产由儿子分享,女儿没有继承权。<sup>[24]</sup>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大明街”、蒲甘城中的“汉人地方”以及“桂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是缅甸华侨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第二,聚居的华侨一般从事共同的商贸活动或专事农耕;第三,聚居的华侨有共同的信仰或一致的心理认同。他们或是以明朝人自居,或是以诸葛孔明作为他们的共同信仰,或是以桂王后裔而存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在谈及华侨社会形成的标志时曾指出:“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联系及民族心理状态,可称为华人社会。”<sup>[25]</sup>因而,我们可以说,到明代华侨社会已经在蛮莫、普坎以及阿瓦等上缅甸的部分地区形成。

总之,随着中缅之间贸易的渐趋繁荣,在元代出现了因贸易而寓居于该地的华侨,而到了明代则在上缅甸的部分地区形成了华侨社会。

## 二、清代华侨寓居缅甸人口的急剧增长

清代是缅甸华侨急剧增长的时期,他们不仅通过陆上滇缅古道,而且从海上利用帆船向缅甸大规模迁移。与以前相比,清代缅甸华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代,在寓居缅甸华侨的分布范围上有所扩大,在其所从事的职业范围上有所增多,华侨社会则在缅甸较大范围内形成和出现。

### (一) 陆上移民

从17世纪中叶开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明清两朝的更替,造成了兵荒马乱、人口减少、经济停滞的局面。经过了这一大变动之后,到了18世纪的“康乾盛世”时期,经济恢复,社会发展,人口膨胀。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地少人多,人口就业压力非常大,而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较,云南地处西南地区,人口密度和开发程度均较低,这对寻求谋生机会的内地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又恰逢战乱之后,滇缅边境贸易甫经开放,内地民众便蜂拥而至,趋利前往。

#### 1、清代滇缅贸易与移民

清政府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后,滇缅贸易又恢复了往日的繁盛。

腾越仍是一个贸易巨区。据《腾越州志》的记载,“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其缅甸所产宝石、碧霞、印红等光珠之类,皆从腾越进,因此,州城八保伪为“八宝街”。<sup>[26]</sup>另有老官屯、新街、蛮莫等处亦为贸易辐辏之地。据清朝官员记载说:“每年秋冬瘴消,缅夷以其所产之盐、咸鱼、棉花、象牙等项,用船载至老官屯、新街江岸,而内地附近民人以内地所产之铁针、棉线、布鞋、绸缎、红绿黄丝、布匹、核桃、栗子等物,用牛马驮至新街、老官屯与之交易。至二月瘴发,即各散回。”<sup>[27]</sup>

尽管在乾隆年间,中缅发生战争,双方贸易一度受到影响,但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滇缅贸易再次繁荣。“牛四百头,马二千匹,又结队自滇南下,有如往日”。亦有乘船沿江而下的贸易者,圣基曼奴在《缅甸帝国》中对此论述说道:“云南华商自拱洞沿阿瓦大河(即伊洛瓦底江)乘大舶至缅甸,携来彼国商品,丝绸、色纸、茶叶、各种水果与其他杂货,归国时载运棉花、生丝、花盐、雀羽和一种黑

漆。<sup>[28]</sup>有人说,在19世纪初,每年从上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棉花,有1000万斤,又据克劳福德1826年的估计,当时中缅陆路贸易额达40多万英镑。<sup>[29]</sup>

随着滇缅贸易的繁荣,因贸易流寓于缅甸的华侨人口亦大幅增加。有记载说:“从云南、广东和中国其他地方前来的富商,都已在很早以前居留在缅甸,并且渐渐繁衍,遍布全国,有许多村落中的巨室,都是华侨。”<sup>[30]</sup>另据记载,19世纪初年,在八莫经常有500个中国商人住在他们所经营的棉花货栈内。<sup>[31]</sup>在这个时期,八莫有房屋约1500座,如果将其邻近的若干村落计算在一起,共约有2000座,其中最少有200座是中国人居住的。<sup>[32]</sup>在阿瓦也有两条汉人街,据说每一条长五六里,“而散居各街之商号亦多”。<sup>[33]</sup>根据庄国土教授的统计,鸦片战争前,缅甸华侨商贩当在5-6万(以八莫地区最多)。<sup>[34]</sup>

在华侨人口大量移入的同时,在华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一些反映华侨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建筑物亦相继出现。如在缅甸阿摩罗补罗,华侨于1773年建有一座观音庙,其内供奉着一座巨大的白玉观音像。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它建于1806年,同时期孟拱也建有一座大的关帝庙。<sup>[35]</sup>在缅甸的都城阿摩罗补罗另有一个中国古庙,古庙中还刻有5000个中国玉石商的名字,他们都是在19世纪先后到缅甸经营玉石生意的。<sup>[36]</sup>不知道这5000个玉石商的名字因何刻于古庙之中,出资建庙者?抑或是在玉石贸易领域里有杰出贡献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中缅之间繁荣的玉石贸易使得很多华侨移居缅甸,因为从事同一个行业,他们聚居在一起。古庙以及5000个玉石商是他们在心理上所一致认同或崇敬的。

在曼德勒也有一座清真寺,有记载说它是在云南回民大起义期间,杜文秀为取得财政收入,派人入缅经商,并派一位姓马的都督,于1868年建立的<sup>[37]</sup>,以方便那些入缅经商回教徒的宗教活动。

王芝在同治十年(1871年)曾经缅甸去英国的伦敦,后将沿途经历及见闻写成《海客日谭》一书,书中对于缅甸之华侨状况多有记载,如对新街(即古之江头城)的描述,他言道:“新街有汉人街,屋制略如中国,瓦屋亦间有之。滇人居此者约千余,腾越人居其九,以关汉寿行台为会馆。楼台廊阁壮丽,如中国制。”新街有诸葛祠,壮丽少亚关汉寿行台。祠象露冕仗剑指南而立,相传武乡侯欲取阿瓦而阻于野人山,是以遗恨。露冕仗剑者,营中南顾象也,自永昌以南,象武乡侯皆如是。”<sup>[38]</sup>另据王芝所记,在谟拉善那城(即阿摩罗补罗)西三十里的“金多眼财神祠”亦中华人士所建,当地华侨还在该祠宴请王芝一行。<sup>[39]</sup>看来华侨所建之寺庙、会馆、祠堂,不仅是他们祭祖拜神之地,亦是华侨聚集活动之所。

## 2、华侨矿工

除到缅甸贸易外,开矿的也不少。缅甸矿产资源丰富,不仅出产各类宝石、玉石,而且产银。银厂在明代可能已有华人参加开采,但当时的矿厂,记载较多的主要是宝石厂和玉石厂,银厂并不为内地所注意。但到清代,华侨对银厂的开采增多起来,缅甸的银矿主要有大山厂和茂隆厂,由于缅甸人“不习烹炼法”,因此两座银厂均由华侨开采,缅甸政府只设官收税而已。<sup>[40]</sup>

根据周裕《从征缅甸日记》和王昶的《征缅纪略》的记载,大山厂亦即波竟山厂,有来自江西、湖广及云南等内地贫民上万人至此采矿<sup>[41][42]</sup>,但赵翼在《簞曝杂记》中则说:“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sup>[43]</sup>周裕、王昶与赵翼在开矿华侨矿工数量的记载上虽存有误差,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银厂矿工流动性很大,很多入缅华侨往往身兼两职——贸易好时,即为商人,资本耗尽,欲归无计时,则常常觅矿谋生。<sup>[44]</sup>

在对大山厂的开采中,明末桂王入缅时所带军民的后裔,即桂家,亦是主要力量之一。赵翼在

---

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记载缅甸的棉花从明代开始输入中国云南,到1826年输入云南的棉花共达1400万磅,价值22.8万英镑。

《平定缅甸述略》中记载：“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沦于缅，自相署曰贵家，据波竜厂采银。”<sup>[45]</sup>他们由宫里雁带领，为缅北的开发贡献了力量。

茂隆山银厂在波竜厂迤东，云南孟定土司辖地的西邻卡瓦佉族地区内，明代开业。据说“历辈开采，未能旺盛”<sup>[46]</sup>，后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云南石屏州贫民吴尚贤着手经营，“矿砂大旺”，“厂大赢”。因而茂隆银厂聚集了大量前来开采的华侨矿工。据云南总督张允随乾隆十一年的奏折，在“茂隆银厂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人”<sup>[47]</sup>而《缅甸考》的记载是，在茂隆厂兴旺时期，“聚众至数十万”<sup>[48]</sup>。这似乎有些夸大，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猜想到当时赴缅茂隆银厂从事开采的华侨矿工人数之众。

另外，清代缅北华侨也和明代一样，开采、贩运玉石者每年达上千人，孟密就是著名的玉矿厂。还有到孟养户拱开采琥珀的，英国人韩莱有记载说：“1836年来矿厂（户拱）的中国人共480人。”<sup>[49]</sup>据庄国土教授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缅甸北部的华侨矿工当在5—6万。<sup>[50]</sup>显然，入缅矿工成为清代缅甸华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3、战俘和流散士卒

乾隆年间，清军两次征缅皆以失败而告终，主将明瑞战死，被俘清军士兵仅羁縻于缅京者就有2500名。这些人定居当地，“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甸为妻”<sup>[51]</sup>。此外，流散在缅甸农村的中国士卒也不在少数。

#### （二）海路移民

华侨从海路大规模移民缅甸要晚于从陆路的移民，克里斯坦曾言，书籍未曾记载1800年以前曾有过大批中国人从海道来缅甸的事。<sup>[52]</sup>究其原因，这或许取决于1800年以前缅甸的人口分布和下缅甸经济发展状况。史籍中记载，“1800年前后缅甸人口估计有470万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上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景温江汇流地带。那时，下缅甸大部分为未开发的沼泽地。”<sup>[53]</sup>如此情况，对于华侨从海路移居缅甸当然缺少足够的吸引力。

但1800年以前没有大规模华侨从海路移民缅甸的记载，并不完全否定存在着小规模、零散的华侨从海路移居缅甸的可能。据记载，1755年缅甸王雍籍牙从孟族手中取得大光，改名仰光，辟为商埠。“当时江边已有一个中国码头，英人称之为China Wharf，因中国人聚居该地而得名。”<sup>[54]</sup>勃生港在1760年时也有华侨居留。<sup>[55]</sup>谢清高的《海录》中亦记述在缅甸的土瓦有广州的客商居住于彼。<sup>[56]</sup>

不用再多举例，在1800年以前有从海路移居到缅甸的华侨已很显然。但是，为什么1800年以后华侨会大规模从海路移民缅甸呢？这主要归因于下列因素的影响。首先，鸦片战争后，从康乾盛世以来清朝所面临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仍持续下来。或者说人多地少仍是造成华侨移民海外的最根本原因；其次，到19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带动了其国内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新技术和新机器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使其对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比以往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1824和1852年的两次英缅战争即是这一需求的表现之一。战争的结果，英殖民者占领了缅甸沿海地区，将其置于英属印度总督的管辖之下。为了掠夺当地丰富资源，英国殖民者大力开发下缅甸，从而造成对劳动力、手工业技术工人和商贩的大量需求。中国闽粤地区的商民在国内的“推力”和国际的“拉力”作用下，涌向了下缅甸。正如布赛尔所说：“中国人开始自海上大规模移来，这是正当英国在缅甸建立势力的时期。”<sup>[57]</sup>

由于资料上的缺乏，我们无法准确的统计在这次移民潮中有多少闽粤等沿海居民移民下缅甸，但是，通过相关的研究以及清朝的一些外交使节的日记或游记我们仍可以了解当时海路华侨移居缅甸的大致规模。

据王芝《海客日谭》的记载，1871年，在仰光“广东、福建通商者数万人。”<sup>[58]</sup>1886年，两广总督张

之洞派遣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候选知府余璠前往南洋各地访查华民商务。他们在仰光看到那里有华侨“三万余人,闽商居三分之一,生意较大,粤人虽多而生意次之”。<sup>[59]</sup>到1891年,根据薛福成呈递总理衙门的信函,仰光华商不下五六万人。<sup>[60]</sup>而宣统元年(1909)时,仰光华侨已有10万人。<sup>[61]</sup>

除仰光外,下缅甸其他的海口商埠华侨也很多。缅甸问题专家富尼华(J. S. Furnival)曾提到,1861年英属缅甸(包括丹那沙林、阿拉干和勃固三个地区)有华侨10254人。<sup>[62]</sup>19世纪90年代,在缅甸沿海地区的毛淡棉、土瓦、丹老三埠,“华商约二万四五千人,生意之大,首闽而次粤”。<sup>[63]</sup>

海路华侨大规模移居下缅甸,直接或者间接对缅甸的贸易重心的变化、在缅甸华侨和滇商主导中缅贸易的格局以及华侨社会在下缅甸的形成发生了作用。首先,关于缅甸的贸易重心。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由于滇缅陆路贸易的繁荣,缅甸北部的八莫、蒲甘、阿摩罗补罗等地成为了缅甸的商贸中心和重心。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英国殖民者致力于开发下缅甸,大力招徕华商、华工,致使海路华侨大规模移居下缅甸,下缅甸的几个商埠,如仰光、勃生、毛淡棉等迅速崛起,赶上甚至超过上缅甸的几个商贸中心,其商贸重心也随之南移。

其次,改变了在缅甸华侨及滇商主导中缅贸易的格局。19世纪中期以前,中缅陆路贸易发达,云南人因为近水楼台,不仅掌控大部分中缅贸易,而且在移民缅甸的华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因而在上缅甸逐步形成了以云南籍华商主导中缅贸易的格局。但19世纪中期以后,来自于闽粤地区的海路华侨大规模移居下缅甸,不仅在华侨数量上而且在引领中缅贸易上逐渐形成了与上缅甸滇商分庭抗礼之势。正如姚文栋所言:“缅甸海口之埠凡三处,而仰光扼其要;沿江之埠二十二处,小者二十九处,而阿瓦与新街扼其要。海口商务,闽商主之;沿江商务,滇商主之。”<sup>[64]</sup>

第三,下缅甸各地华侨会馆、华侨组织纷纷成立,一些反映华侨心声的华文报纸陆续创办,也间接反映了华侨社会在下缅甸的形成。(1)建立的华侨会馆主要有:清咸丰五年(1855)粤籍华侨在勃生建立的三圣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仰光的福建观音亭(庆福宫)破土动工,同治三年(1864年)仰光的广东观音庙重修。这些庙宇的功能主要是管理各籍人士的祭祖、墓地以及其他公益事业。除此以外,在仰光建立的会馆还有:五邑会馆(1864年)、宁阳会馆(1865年)、建德堂(1868年)、龙山堂(1878年)、新会公所(1885年)及肇庆会馆。(2)华侨组织陆续建立。除了庙宇、会馆之外,地缘、血缘和业缘亦是聚合缅甸华侨的纽带。此时期华侨建立的宗族组织主要有颖川公司(1854年)、陈家馆(1861年)、李家馆(1862年)、溯源堂(1891年)、伍氏家塾(1893年)、梅氏书室(1894年),其他如黄家馆、古城会馆、曹氏馆、梁家馆、朱家馆、中山馆、阮家馆等均在1912年前成立。1909年最早的业缘性团体中华商务总会亦宣告成立。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近半个世纪中,缅甸社会先后成立了上百个宗亲会、同乡会和业缘团体,它们构成了缅甸社团的基本格局。<sup>[65][66]</sup>(3)华侨热爱祖国,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受中国同盟会的影响很大,开始创办华文报纸,宣传革命。第一家华文报纸是1903年创办的《仰江新报》。1905年,革命党人秦力山来仰光,开始在缅甸宣传革命,得华侨庄银安的介绍,在该报发表《革命箴言》。1908年在仰光成立了中国同盟

---

由于海运事业的发展,从仰光到闽粤两省的贸易量已大大超过了滇缅之间的陆路贸易量。例如,棉花的出口,“每岁贩入云南者十数万驮,其运海口者尤数倍于此”。又如缅甸北部出产的玉石,“萃于阿瓦都城,然缅甸无良工,汉商贩取璞石,择其质之美者至粤中雕琢成器。近世海运便捷,故美玉之至滇南者寥寥无几矣”。参见黄懋材:《西轱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988-989页。

据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续刻》卷6(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8页)中所记,在上缅甸“滇商散布于沿江及山中各埠,约在十万人左右”,而19世纪中期后,下缅甸的华侨,仅仰光一处,到宣统元年时已达10万人,加上海口其他商埠的华侨,也有12万之众,如果扣除云南籍以及其他省份的部分华侨,下缅甸闽粤籍华侨总数亦在10万人左右。至于主导中缅贸易的问题,本页注释中已作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会缅甸分会,又收购《仰江新报》设备,改出《光华日报》。之后的3年间,又有《商务报》、《进化报》和《缅甸公报》陆续出现。<sup>[67][68]</sup>

## 结束语

中缅之间贸易交往虽发端于汉代,但直至元代时,在我国的史书中才有华侨定居于缅甸的记载。明代中缅交往不断扩大,华侨开始较大规模地移居缅甸,其中既有因贸易而寓居于该地者,也有中国内地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迁居于彼者,还有是随永历帝避难而留居于缅甸者。随着寓居于缅甸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多,出现了诸如“大明街”、“桂家”之类的华侨聚居区,同时,他们从事共同或相互联系的职业,并具有共同的信仰或一致的心理认同,于是华侨社会在华侨人口较为集中的上缅甸的部分地区形成和出现。清代是华侨大规模移居缅甸的时期,其迁移人数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其规模应该远超过明代。从移民途径上来说,既有陆路也有海路,而19世纪中期以后从海路来自闽粤沿海地区的华侨大规模涌入下缅甸,从而改变了在缅华侨的格局——从前,以居住在上缅甸云南籍华侨为主导,至此,形成了下缅甸闽粤籍华侨与上缅甸云南籍华侨分庭抗礼的态势。同时,一些能够聚合缅甸华侨的纽带,如地缘组织、血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纷纷成立,则标志着华侨社会在下缅甸形成。

### 注释:

- [1][3] [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4、233页。
- [2]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1页。
- [4]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305页。
- [5] 姚思廉:《梁书》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7页。
- [6]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2页。
- [7] 赵汝适:《诸蕃志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0页。
- [8][11][24][37] 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1、41-42、104、206页。
- [9] 阙名:《缅甸新纪》,载余定邦:《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13页。
- [10]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 [12]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页。
- [13] 陈孺性:《汉、唐至宋、元时期在缅甸的华人》,载《海外华人研究》(台湾)1992年第2期。
- [14] 卢伟林:《缅甸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第38页。
- [15][31][36] 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5、46页。
- [16][23][26] [清]屠述濂:《腾越州志》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6页;卷十《缅甸》,第160页;卷三,第46、45页。
- [17]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 [18] V. C. Scott, *The Silken East: A Record of Life and Travel in Burma*, London, 1904, p.7.
- [19][28][51] 戈·埃·哈威著:《缅甸史》下册,姚梓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91、453、548、453-454页。
- [20][21] [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 [22] 铃木中正、荻原弘明:《桂家宫里雁与缅甸华侨》,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 [25]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藏:《朱批奏折》外交类,第142-1号,乾隆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傅恒奏折。
- [29] 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 [30] 张正藩:《缅甸华侨史话》,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5年,第4页。

- [32][49][52][57]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11、10、12页。
- [33][63] 陈还:《缕陈缅甸近年情形》,载余定邦等:《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08、1400页。
- [34][50]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 [35][55] 黄绰卿:《缅甸华侨史的一页》,《新仰光报》1963年10月5日。
- [38][39][58] 王芝:《海客日谭》,光绪丙子石城刊本,卷一,第20页;卷二,第1-4页;卷三,第4页。
- [40][43] [清]赵翼:《簞曝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3页。
- [41] 周裕:《从征缅甸日记》,借月山房汇钞本,第7集。
- [42] 王昶:《征缅纪略》第五集,清宣统至民国间上海国学扶论社铅印本,第1页。
- [44][47]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32页。
- [45] 赵翼:《平定缅甸述略》,载《皇朝武功纪盛》卷三,《瓯北全集》本。
- [4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移会,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02-603页。
- [48] 《緬考》,载于师范:《滇系》第二册《典故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40页。
- [53] M 伊斯梅尔·K 貌:《缅甸人口的趋势》,《东南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
- [54] 陈孺性:《十八世纪时的仰光》,《新仰光报》1956年5月2日。
- [56] [清]谢清高:《海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0页。
- [59]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卷三,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76-177页。
- [60] 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213页。
- [61] 陶思曾:《藏轺随记》卷二十一,载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曲石丛书本,第23-24页。
- [62] J. S. Furniva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56. p53.
- [64]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75页。
- [65][68] 陈茜:《缅甸华侨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趋势》,《云南侨史通讯》1988年第1期,第9、10页。
- [66] 范宏伟:《战后缅甸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4年,第30页。
- [67] 方雄普:《有关缅甸华侨华人族群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3页。

[责任编辑:乔云]

## A Brief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Emigrating to Burma Befor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merge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Burma

FENGLi-ju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This paper mainly elaborates the intercourse process of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urma. I thought that although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m began in the Han Dynasty , the overseas Chinese had settled in Burma until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began to emerge in some areas of the upper Burma. The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transplanted to Burma in large-scale through both land and sea routes. With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transplanting to Burma , some ties that can polymerize together the overseas Chinese , such as the hometown-tie organizations , the blood-tie organizations and the job-tie organizations were founded in succession.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Burma had emerged from more areas.

**Key words :** Burma ,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 transplantation